

「無罪推定」就等於「必須保釋」？

深度
評論
李繼亨

黎智英涉嫌違反國安法，仍獲法官給予保釋，引起社會的強烈質疑。一些法律界人士對此聲稱，香港向來有「無罪推定」原則，因此不予黎智英保釋就會破壞香港法律制度云云。這是極其可笑的混淆視聽言論，難道「無罪推定」之下，就意味着所有被告都可以獲得保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今年9月23日發出的《聲明》中，已經明確指出「保釋」須受到國安法限制。因此，拒絕黎智英的保釋申請，並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也完全符合普通法制度。

「無罪推定」是普遍行諸世界各地的法律制度，也被視作是一項基本人權，在普通法地區尤為突出，被形容為「貫穿於刑事法的金線」，實際上大陸法地區如內地，在《刑事訴訟法》內亦有類似的規定。這項原則保障了被告人的

權益，避免出現無辜者。但同時也要看到，保釋作為一項被告人的權力，並非絕對的，必然受到限制。普通法地區，拒絕嚴重罪行以及有高度潛逃風險被告的保釋，例子比比皆是。

保釋不是常態而是例外

香港依循英國的法律制度，保釋規定也基本上根據英國標準而行。在香港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中，載有准予或拒絕被告人保釋的詳細條文。當中第9G條列出可拒絕被告人保釋的情況，並訂明：「法庭如覺得有實質理由相信被告人會有下列行為，則毋須准予被告人保釋—（a）不按照法庭的指定歸押；或（b）在保釋期間犯罪；或（c）干擾證人或破壞或妨礙司法公正。」當中的（a）項，就是指有重大的潛逃風險。

如果按照某些人的邏輯，既然有「

無罪推定」，又何需設下如此多的「例外」？這豈不是違反了普通法的法律原則？這顯然是講不通的。拒絕一個被告保釋，並不等於即時宣告其「罪名成立」，而是基於客觀條件以及法律要求作出的法律規限，否則，任何被告都可以保釋，法律的存在也就沒有意義了。

其實，落實並遵行香港國安法，與尊重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兩者並不矛盾。國安法第42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行為的，不准予保釋。」這條規定，明確列出了兩條要求，一是「充足理由相信」，二是「繼續實施危害國安行為」。

香港國安法與普通的香港法律地位是明顯不同的，前者是經全國人大「決定」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全國性法律，具有凌駕性地位。國安法的規定，不是「可遵行、可不遵行」，而是「必

須遵行」。事實上，今年9月23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出一份聲明，其間在談到「保釋」一節時，明確指出：「保釋假定與上文提及的無罪假定兩者一致。准予保釋的假定有一項限制：見《維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二條。」

從法治原則、法律規定，再到終院的立場聲明，都在顯示，「無罪推定」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獲得保釋，被告的保釋，在國安法之下不應是「常態」，而應是「例外」。本案被告黎智英不論是過去行為，還是法庭對其高度潛逃風險的認定，都說明，不予保釋是最符合法律要求的決定。

正如輿論所指出的，過去一年來，美國對香港的一系列「制裁」，黎智英無疑發揮了重要幫兇作用；黎智英被捕後，多名西方政治人物迅速施壓特區政府放人，這恰恰進一步坐實了「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介入」的相關指控。何況，從許智峯到曾志健，過去半年出現大量的棄保潛逃例子，甚至是用公然羞辱法庭的方式潛逃外國，如果法庭繼續「仁慈」，法庭的威信也將蕩然無存。

必要時由國安公署出手

律政司已就李運騰法官的決定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預計本周四開審。如果法庭繼續准許黎智英保釋，那就是公然的我否定。而根據國安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香港法庭若真的行使不了「管轄權」，國安公署出手也就是必然之舉了。

資深評論員

踏上「不歸路」的正正是戴耀廷

戴耀廷在《明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人心思變》的文章。讀後不禁讓人覺得，作為曾經的「法律系副教授」，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分辨能力，言論錯得離譜。

戴耀廷在文中樹立了兩個陣營，一個是香港人，一個是中國人。這樣的刻意劃分，本身就很有問題。「一國兩制」的本質是什麼？內地人是中國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一國」和「兩制」是不能分開的。請問戴耀廷是否有中國的國家認同和中國人的個人身份認同？如果沒有，那就不用以文章來交流觀點了。

香港去年由修訂《逃犯條例》事件開始，引發了長達半年的嚴重社會暴力事件。內地民眾也非常關注。可是內地民眾觀察到的是什麼現象呢？

【 議論風生
孤煙暮蟬】

求改變政治制度是合理的。」那想請教一下，如果《人心思變》中的判斷即為世界的真理，那如何解釋內地在這23年不改變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持續高速發展，甚至打破了全世界國家高速發展的紀錄？如何解釋澳門在回歸之後，在不改變「一國兩制」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保持社會穩定，保持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人均GDP更是大幅超過香港？

如果戴文的邏輯成立，用中國內地或者澳門的例子，反而證明內地的政治制度，澳門的「一國兩制」更優於「西式民主」。從全球角度來看，其實所有的國家都是混合型經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難道就不存在社會主義政策麼？採用「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中，也有很多發展得不如意的。馬上要進入2021年了，還持有冷戰時代的政治觀、世界觀是很過時的。現在全球各個國家競爭的是國家治理能力。

拿各國抗疫來說，「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中，也有很多抗疫做得很差，民眾健康備受威脅連帶着經濟狀況也是一落千丈。其中甚至包括美國、英國這樣的「民主典範」。

香港這些年的風波，這麼多人參與暴力事件的原因是複雜的，這麼多人表達對現狀的不滿，其中當然有經濟問題的因素在。全球化一方面帶來機會，一方面帶來挑戰。香港這麼多年來，產業空心化，越來越偏向於虛擬經濟和金融產業、服務業。帶來的是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往頭部集中，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可是要改變這種局面，是不是只要追求「西式民主」、要和中國內地進行切割就能解決問題、這就能使得香港人的生活越來越好？顯然不是。

或許香港可以多看看澳門的例子，國家認同感不斷增強，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斷得到強化，逐漸靠近和融入中國大一統文化，融合到中國大國崛起的

歷史機遇之中，融合到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經濟機遇之中。

找到合適香港經濟發展的、能最大程度公平分配利益與財富的核心支柱產業，使得香港經濟活力再現。這一切不是不可能發生，但前提條件，顯然不是目前香港越走越遠的暴力事件，或者所謂的追求「西式民主」就能提供的。

戴文另一個要表達的觀點是「中央違背了對香港實現普選的承諾」。這根本是顛倒是非。事實上，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是基本法，而不是《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是個法治社會，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文以及對於香港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基本法中寫得明明白白。中央政府有哪一點不符合基本法？有哪一點違背了承諾？到底是誰違背了基本法？所以，究竟是「人心思變」，還是「有心人」思變？

以「西式民主」掩飾「港獨」

香港過去幾年這麼多風波，實際上就是「有心人」在試圖通過謠言，通過組織、煽動暴力事件，以破壞香港社會穩定繁榮來要挾特區政府、中央政府。推翻基本法，實現所謂的「真普選」是這些「有心人」的表面目的和政治口號。追求「西式民主」也只是這些「有心人」吸引很多在全球化之下，在香港產業空心化之後，有相對剝奪感的香港民眾的政治手段而已。這些人要的不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是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

內地民眾對香港原本是充滿好感的，畢竟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的經濟繁榮、文化影響力覆蓋大半個亞洲。香港的巨大成就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但香港這幾年風波不斷，所有中國人都很心痛。戴某這篇《人心思變》最後說「中港之間已踏上不歸路」。有任何一個中國人會希望兩者踏上不歸路嗎？

請問戴耀廷，都是中國人的內地人和香港人，怎麼就會踏上不歸路？想讓同為中國人的內地與香港走上不歸路的究竟是些什麼人？他們是哪國人？他們究竟站在哪國利益和立場的角度？

【 議事
論事
張敬偉】

法官批准黎智英保釋了。

這不是愚人節假新聞，而是聖誕節前的真新聞。23日，黎智英第三度申請保釋，居然獲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保釋。保金1000萬港元另加人事擔保，保釋期間每周要到警署報到3次，除報到及到法庭應訊外，需要留在住所，不得離家，並要交出旅行證件。

儘管如此，誰能保證黎智英不會潛逃？須知，此人可是反中亂港的大佬，一不缺錢二不缺資源，即使待在家裏，也可靠互聯網獲得海外反華勢力的支持。而且，黎智英被控的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一項欺詐罪。如此重罪，說保就保，法律尊嚴何在？

難怪，全國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強調，香港是法治之區，不管後台多硬，不管在外國有什麼保護傘，犯刑法或民法（包括誹謗法）的人都要受到制裁。梁振英同時提醒：有關部門要主動，要有擔當，政治勢力不能凌駕法律。

確實！一眾反中亂港政治人物，上午被逮下午即放的戲碼不斷上演，亦不斷損耗香港法治社會的尊嚴。如果司法獨立的意思是可以隨意為觸犯法律的人開脫，則如同賦予某些人凌駕於法律以上的政治特權，香港法治將淪為笑談。

被告獲准保釋，最後變成方便其潛逃之門，過去已多次發生。曾經的「十二瞞逃」事件及旺案案主犯黃台仰逃亡案如此，不久前的許智峯經丹麥潛逃英國亦如是。再如囂張的青年亂港分子黃之鋒，去年8月被捕保釋後，不思悔改之餘，反而在「黃媒」與外國勢力渲染下成了「亂港英雄」。

部分一再給犯罪分子開保釋後門的法官，實際上助長犯罪，是香

港司法界的害群之馬。這樣的法官在司法體系中，期待法庭可以體現法治正義就是奢望空談。前車之鑒未鑒，後車之覆依然，此次法官批准黎智英保釋，難免予人香港司法制度不省自身，甚至因為同情特定政治人物而法外施恩之感，一旦公眾產生這樣的印象，則必會動搖香港司法體系的根基，嚴重危害香港法治。

香港司法不是法官的禁脔，更非特定政治人物的保護傘，而是護佑香港社會民生的公器。因此，香港司法亟需改革，香港法治不容玷污，必須清除司法界中的西方意識形態至上主義，以及利用法律保護反中亂港者的人。只要這些人還在香港司法界，就會一直為反中亂港分子充當保護傘。

法庭一再錯判助長潛逃

現代法治社會，無論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司法體系都不會為違反國家安全的政治勢力政治人物背書。從全球普遍的法治正義觀審視香港某些法官的行為，不難看出香港司法界的硬傷短板。法律是剛性的，法官是無私的，若法官將剛性法律變成某些特定犯罪分子柔性保釋的工具，不僅是對法治的不敬，也是對香港市民的欺凌。

司法體系改革不能猶豫也不能手軟。如果連法官把髮辮去掉都會引發遺老遺少反彈，香港司法體系如何正本清源？這還只是形式，香港司法改革重要的是內核更新——既要祛除港英遺留下來的殖民思維，又要構建愛國主義和契合「一國兩制」原則的法治體系。法治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若被殖民主義和西方意識形態佔領，香港在法治精神角度而言就只能是西方的附庸。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政情
觀察
楊堅

一年前，香港居民普遍懷着對社會動亂和經濟衰退的深刻憂慮，迎接2020年。那時，大多數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對「黑色革命」暴亂，或者憎恨，或者厭煩，或者困惑。因為，暴亂在那時已持續逾半年，香港經濟已被推入空前嚴重衰退。常說告訴香港大多數居民，不止暴制亂、恢復社會安定，香港經濟衰退勢必進一步惡化。

一年後的今天，2020年即將結束，香港居民普遍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持續逾一年的「黑色革命」暴亂終於被香港國安法所遏止。憂的是，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取代暴亂而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秩序、進一步摧殘香港本已衰退的經濟。在迎接2021年來臨之際，香港社會瀰

漫着急躁、不安、憂愁和忿懣。

人們急躁的是，疫情差不多已折磨了全體香港居民一年，卻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亮。儘管特區政府已宣布從2021年1月起，將分批為全體香港居民接種新疫苗，但是，專家的樂觀估計是要到2021年中可能產生良好效果，專家的審慎估計是，即使分批接種疫苗，也不能避免第五、第六、第七波疫情爆發。也許有人會說，等多一年半載何妨。問題在於，香港已遭受長達兩年的折磨，再受一年半載折騰，必定陷入經濟蕭條而需要長時間調養才能復元。

令人們不安的是，香港深陷疫情，內地和澳門卻早已成功控制疫情而恢復經濟。中國內地是2020年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增長。澳門經濟因為早已恢復與內地正常人員往來而得益。香港

經濟卻因為疫情限制與內地正常人員往來而無法受益。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是對全球不同制度不同國家政府領導力和不同社會價值觀的大考驗。事實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力和中國人民顧全大局的責任感，使中國內地率先取得抗疫勝利，率先恢復經濟活動。在新冠肺炎大流行衝擊下，中國人民依然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如同陽光，穿透全球各國經濟衰退的愁雲慘霧，光耀着中國人民所選擇的道路和制度的正確。然而，香港抗疫經歷四波折騰，有些人故步自封，仍舊以歐美西方國家為參照，不願意向內地看齊。於是，人們不能不產生憂愁。

在第四波疫情爆發前夕，社會已出現要求特區推行全民強制性核酸檢測的

輿論。第四波疫情火頭四起，確診病例和不明源頭病例急劇增加，人們的憂愁轉化為忿懣。

無法「清零」怎有穩定繁榮

2019年面對「黑色革命」暴亂，香港政治的最大課題是維護國家安全。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惡化，香港政治的最大課題是維護穩定繁榮。試問：一波接一波的疫情，使香港社會一次又一次陷入局部停擺，難道不是對香港穩定繁榮的挑戰和威脅？疫情反覆折磨，不僅造成高失業率、高破產或結業率，而且導致不少人患抑鬱症甚至更嚴重的心理或精神疾病，難道不是對香港穩定繁榮深層次的傷害？

特區政府必須明白，香港防控疫情

如此吃力原因在哪裏。因為社會制度不及內地？因為香港公共衛生體制和運作機制存在着缺失？因為本地防控疫情的人力不足、能力有限？因為推行全民強制性檢測的本地資源匱乏？抑或以上各方面都有不足？

特區遏止「黑色革命」暴亂，需要中央行使憲制權責，制訂香港國安法，才將暴亂平息。特區如果無力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中央也只能行使憲制權責給予幫助。踏入2021年，人們高度關注——是由特區政府帶領香港社會各界降伏新冠病毒？抑或必須中央出手相助？是特區政府主動請求中央幫助抑或被動等待中央介入？無疑，這是近期香港政治的最大關切。問題的解答，將牽動香港政治全局，影響香港政治中長期演變。

資深評論員